知

新书馆

《能量与文明》：换个角度讲述人类史

没有能量就没有人类的日常生活，小到呼吸、进食，大到国际经济往来，全都离不开能量。正如《能量与文明》一书的作者瓦茨拉夫·斯米尔所言，“能量是唯一的通用货币”。这里的通用，不仅是就时间而言，而且超越了空间的限制：一部人类史或一部文明史，也就是一部有关能量的历史。斯米尔决心讲述的，就是这样一部从能量视角出发的文明史。

■ 孙伟

“能量”一词，国人肯定不陌生，因为“正能量”和“负能量”的说法充斥着社交媒体，而且具有导向性：要弘扬正能量，消除负能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显然，这里的“能量”已经不取其本义了，反而是在表示对社会的意义和价值，是一个价值概念，而非客观描述。比起探究这种语义转移的起源，更令人好奇的是，为何会在“能量”与人类社会之间构建起一种直接的联系？看似寻常的能量，果真担得起驱动人类社会的重任吗？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因为没有能量就没有人类的日常生活，小到呼吸、进食，大到国际经济往来，全都离不开能量。正如《能量与文明》（九州出版社2021年5月版）的作者瓦茨拉夫·斯米尔所言，“能量是唯一的通用货币”。这里的通用，不仅是就时间而言，而且超越了空间的限制：一部人类史或一部文明史，也就是一部有关能量的历史。斯米尔决心讲述的，就是这样一部从能量视角出发的文明史。

不过，能量这个视角虽然新颖，但操作起来极具挑战性，因为能量往往要求进行量化考察，而非通常的史学编纂那般，以定性的描述作为结论。与此同时，人类的过往似乎拒绝被这般分析。为此，斯米尔采用了一整套复杂的计量工具，将原本虚无缥缈的能量概念变成可感、可比的具体事实，能量的转换效率、能量的损耗、能量的储存，都不再是泛泛之谈，反而是读者据以思考和探索的有力武器。

能量利用与文明转型

大多讨论人类文明的教科书，都会划分出采集–狩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主要的类型。但依据的标准可能远远不止一个，比如人类维持生存所依赖的主要生产方式、制造工具的能力，等等。斯米尔也注意到这一点，并在《能量与文明》中给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在他那里，能量利用既关乎文明的维系，又深刻地影响着文明的转型时期。而对转型期前后的能量利用考察，尤其关键。

人类文明存在两大重要的转型。其一，从采集–狩猎文明走向农业文明。在采集–狩猎时期，直立行走、制造简单的工具、卓越的散热速率，为人类的繁衍和“占据新的生态位”创造了巨大优势。那么，人类的祖先为何会走向从事农业呢？首先需要厘清的是，这并非一蹴而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狩猎–采集与耕作恐怕是并行不悖、兼而有之的；其次，这种转型极为复杂，可能远非出于某个单一原因；再则，“就过程而言，采集活动和农业之间没有明确界限”，因为驯化野生动植物耗时甚久。

可能的原因包括：一是人口不断增长，对环境造成较大压力，迫使人类选择新的生活方式；二是“种植作物是一种确保粮食供应充足的尝试”，加上“采集和狩猎的收益减少”，“定居式作物种植保证了更多人一起生活，因此更容易形成更大的家庭，积累物质财富，组织防御和进攻”；三是世界上多个地区存在类似的过渡现象，而后通过文化扩散和居民扩散两种方式带来了整体上的社会变迁。

其二，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这一点，更为今日读者所熟知，尽管其中涉及的问题千丝万缕，至今难有定论，特别是关于现代化的问题。在农业文明时代，除了种植农作物，人类使用的原动力和燃料，也都极大地受制于自然和技术能力。因此，虽然人口的增长偶尔也会对环境施加较大的压力，但总体上农业文明能够维持人类的长久发展，直到新技术的涌现、新燃料的大量开采和使用、新的生产方式和交通方式的普及——可见，原因远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因素。

能源消耗与文明塑形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人类利用能源的能力和方式，定义甚至塑形了文明本身。史前时代，火的使用无疑是个重要的分界线。从此，木材在用作工具之外，还可以用作燃料，为人类的烹饪和取暖等提供不竭的来源。由于彼时改造自然能力有限，这种伐木取材对自然造成的影响相对有限，而且，人类整体上持万物有灵论，对自然既无比崇拜，同时又感到莫名的畏惧。

到了农业文明，人类更为自信，木材不仅用作燃料，还被用于制造武器和饰品、建造房屋、修筑桥梁等，因而，部分原先绿树成荫的森林逐渐退却，只留下生态破坏的痕迹，不时发生的自然灾害被认为是对此类惯习的惩罚。在人类面前，大自然脱去了其神秘的面纱，但对人类来说，自然更多以其工具价值称道。

再到高歌猛进的工业文明，此时人类的自信心堪称膨胀。伴随着蒸汽机的鸣响和水汽的升腾，人类利用能源的方式得到大幅度改进，时间的奴役和距离的冷酷，都被撇在身后，尽管这种效率实际上仍然偏低。大机器生产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国家之间的你追我赶驱使着整个人类走上了一条通往未来文明的快车道，哪怕在数十年之后，人类才真正体会到这一切带来的成本是何等昂贵。

当然，还有眼下这个时代，它或许可称为“后工业文明”。一方面，人类利用能源的能力和技术得到大幅提升，风能、水能、生物能丰富了能源库，使得选择更加多元，尽管在大部分情况下，传统的能源占据着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人类意识到了现有能源终有一天会枯竭，必须寻找可替代的新能源，尤其是核能。

必须承认，《能量与文明》对诸多问题给出了另类的阐释，令人耳目一新，尽管最终的结论可能很多读者并不陌生。当下，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快车道，这极其消耗地球的能源。对此，即便不是悲观的态度，斯米尔也是无比忧虑的：“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创造一种与高能文明的长期生存相适应的新能量系统这一史无前例的探索并获得成功的机会仍是不确定的”，“真正需要的是做出改变的决心”。可我们有这种决心吗？

品鉴坊

『从前』的从前，《格林童话》想说什么

《格林童话》初版为两卷本，历经多次删改，增补说教故事，于1857年格林兄弟生前出了最终的第七版，质朴的多元化民间实录最终被基督教文化改造为中产家庭读物，许多原始的民间故事被删除或被替换。本文作者认为，《格林童话初版全集》的出版，使中国读者不仅有机会能够见到初版真正的面貌，也能看到格林兄弟编写这部他们眼里代表着民间传统的童话集最渴望传递给读者的是什么。

■ 王帅乃

2020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格林童话初版全集》，在几年前“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下架风波后，中国读者终于有机会能够见到初版真正的面貌。我们也有机会看到，格林兄弟编写这部他们眼里代表着民间传统的童话集最渴望传递给读者的是什么。

从一个“非民间”的共识说起

《格林童话》（原名《儿童与家庭故事集》）并非纯粹的“民间”童话，应该说，这是国际儿童文学研究界的一个共识。

据统计，格林童话中有40%的篇目来自各种文献而非直接的口头采集。而在口述采集的部分里，讲述者绝大多数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她们的先辈在上流社会的沙龙中讲述这些故事。除了故事来源不够“民间”，格林兄弟还为收集到的故事原材料作了文学加工，七个版本的反复修订，到1857年推出最终版尘埃落定，这些故事早已不是原始素材的模样了。

那么，格林兄弟是否如部分批评者所言“欺骗读者”，将他们的故事包装成来自农夫并宣称它们代表民间传统呢？既然他们要挖掘“自然之歌”，为什么对讲述者身份不加选择又反复加入文学性改写呢？

实际上，除了那时的研究与改写工作并不受如今已较为成熟的相关专业规范的约束外，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格林兄弟搜集这些故事的直接缘起并非是要将它们作为孩子们的床头故事，而是出于两位语言学研究者对专业研究和民族文化的深刻感情。用著名童话研究学者杰克·齐普斯的话说，“在他们的工作背后，是一种对浪漫的渴求，是在故事绝迹前挖掘并保存大众对德国文化做出的贡献。”

此外，格林们写在初版（第二卷）的前言摘录透露并解释了他们“不严谨”的秘密——出于对讲述者态度的感动，更是出于对存在某些永恒价值和对“历久而弥坚”“大浪淘沙”等口述脚本筛滤机制的信任。他们恰恰认为收集童话的各种异文版本，反复对比融合，直至琢磨成一颗颗他们眼里最光彩夺目的宝石，是保存那些最重要的价值与道德观所必须有的工序。他们所找的那些人——直接信息来源在他们眼里只是中介物，因为他们坚信民间故事中最值得保留的最耀眼的部分在一次次的口传中将会得到很大程度的保留；而他们修改故事亦是如此——因为他们热忱地相信故事最珍贵之处在于承载了德国民众代代流传的精神财富和道德结晶，这些结晶需要也最适宜由他们这样的语言学者来识别和萃取。

然而，1812年第一卷出版后，批评家们反应平平，人们认为有些故事太过残忍，人物形象也不够吸引儿童。1819年第二版的改动充分说明格林兄弟还是受到了这些批评的影响，它们更考虑儿童读者的感受和大众的阅读喜好，在故事的选择和讲法上作出了明显的调整。以此来说，如果读者想知道格林兄弟最初希望大众从故事中获得的“价值”和“道德”究竟是哪些，故事的初版理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从删除与保留中追溯“格林童话之心”

“格林童话之心”是什么？答案蕴藏在七个版本的修订整理中。从初版到终版，格林兄弟删除的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种：一是太多恐怖暴力的故事，比如《孩子们如何在屠宰场玩耍》；二是非源自德国的口述传统故事，比如《笨蛋汉斯》《蓝胡子》；三是替换为格林们更喜爱的版本，或者将多个版本进行合写。改动的则主要有可能引起性联想的部分，比如《莴苣》中暗示女孩怀孕（衣服变得不合身了）的文字；将作恶的亲生母亲替换为“继母”。童话研究家玛丽·塔塔尔认为这是格林兄弟将目标读者逐渐明确为儿童后，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自然而然作出的选择，修订的方向主要是迎合了当时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和教育观。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用齐普斯的话说，“尽管格林兄弟是政治上的‘自由派’，但他们仍尽量避免出版那些过分激烈向父权体系和君主表达反对与不满的故事”。初版故事更多地保存了原始素材中弱势者的反抗内容。弱势者之间彼此合作共同战胜邪恶获得正义的故事尤其受到兄弟俩的偏爱，在首版中可以说占据了核心的位置。虽然这种精神在后续的版本中延续了下来，但仍然有许多相关的好故事在修订中被回避或排挤掉了。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格林童话的修订体现的是19世纪德国社会现代童年观的确立——儿童被视为有别于成人的独立生命状态，儿童需要接受适当的教育的理念已被普遍接受。格林兄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出了筛选并修改文本的选择，他们希望这部童话集成为适宜于儿童的“教育之书”。拟人和对话等修辞的增加，“重复”等叙事结构的强化，暴力与性内容的删减，也确实为他们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儿童受众。

或许格林们正是在编写、出版、阅读评论和修订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从普遍受众到真正将儿童确立为目标受众，最为契合他们收集编写故事集的原始动机——将散落遗留在乡间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纯粹天真、滋润人生”的古老故事采集到一处，让其中“总能诚心相待，相互支持”的精神和万物有灵的博爱信念在德国的土地上绵延不绝，他们逐渐深刻地感受到这些特质与天真儿童的心灵最为自然接近，他们说自己“更喜欢星星与被抛弃在森林里的可怜孩子之间的对话”，而前述理想的未来也须由孩子实现。

于是，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阅读他们在1812年初版第一卷序言中所写下的“宣言”：他们要为这个民族的心灵塑造一个“抖落虚假，笨拙者仅凭一颗纯洁的心即使被欺骗或轻视也最终能获得幸福”的空间，一个珍视弱势者的反抗和报偿的以“善良”为基石的童话空间，并且让这些“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大自然的成果”回到孩子们的手中，“就像云彩滋润了大地后回归本源”——我们发现，一切其实并未离开这一最初的心愿，在删改、保留和添加之间，格林兄弟始终抱持着的属于他们的“童话之心”终于浮现在我们的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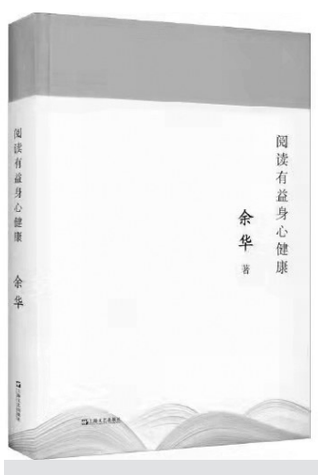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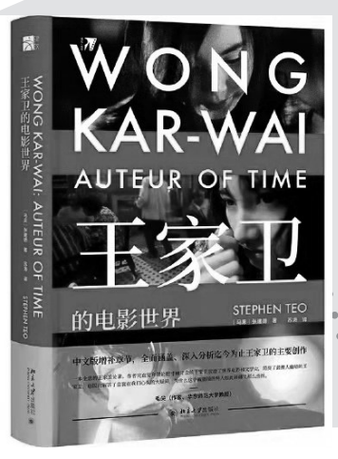
阅快递

《阅读有益身体健康》

余华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5月版

本书是从余华所著随笔、杂文、演讲稿以及前言、后记中选出，并由本人审定，共选文三十余篇。余华由自身的文学创作及阅读经验出发，又回到文学本身，谈论文学之于人生、之于审美的价值，这是一个作家在理性地言说文学的魅力。本书所选文章的时间跨度长达十余年，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10年代，在这个跨度中，既包含余华在创作风格上的转变，也包含着余华在文学观念以及对不同的艺术作品、艺术家在关注度上的细微改变，这些改变需要读者在这部文集中通过余华写作的时间线而细细品读。





《王家卫的电影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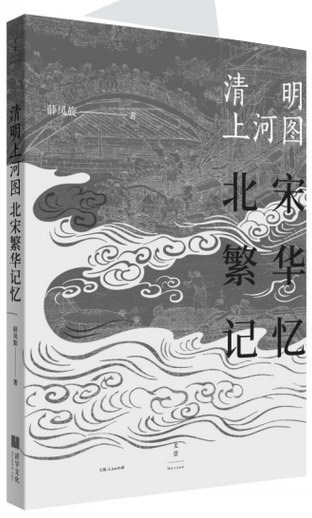
[马来]张建德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版

本书是系统论述香港导演王家卫的开先河之作，作者在回顾王家卫职业生涯的同时，又深入分析了其迄今为止的电影创作。此外，作者还将王家卫拍摄的广告、MV等一并纳入讨论范围。本书剖析了王家卫所受到的电影和文学方面的影响（从马丁·斯科塞斯到希区柯克，从曼努埃尔·普伊格到村上春树），并且审视了王家卫如何超越这些影响。值得称道的是，张建德准确地指出，王家卫影片背后的互文场域所牵涉的并非单一门类的灵感来源：他解释了王家卫所指涉、挪用的其他艺术家和艺术门类的美学实践为何如此重要，以及它们如何建构了王家卫影片的独特面貌和叙事特性。

《清明上河图：北宋繁华记忆》

薛凤旋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版

本书作者在书中将《清明上河图》这幅国宝级的画坛极品分解为二百多个细节，让图像本身来说明那个大时代的新城市在经济、人文、科学和管理机制上诸方面具体而微的状况。通过150多张精选《清明上河图》局部图片，立体还原北宋城市场景与生活习俗。数百处细节提示解读，带领读者深入了解传世名画创作的背景与内涵。中国文明史和城市发展史上的划时代的变化首先出现于北宋。读者得以从这幅名画当中，管窥北宋中国经济、文化、教育的繁荣和民众生活的丰富景象。



（言浅 整理）